

## 对以儒教形式复兴儒家的几点困惑

○ 方朝晖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近年来提倡复兴儒教的声音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模仿基督教、佛教等建立宗教组织,为儒家的复兴注入活力。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儒家是全面入世的,它的组织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一般宗教不同,没必要模仿其他宗教建立组织;其次,今天儒学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内而不在外,未能在今日生活中激活其价值、向世人呈现其无穷的生命力,不要幻想建立基督教那样严密的组织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儒家;儒教;宗教组织

不少人都在倡导儒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主张模仿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那样,建立完备的宗教组织,确立严格的身份认同,塑造严密的宗教仪式,以此来复兴儒家。这一思路的深层原因是认为,别的宗教都有组织,儒家没有严密组织,所以竞争不过,这是今天儒教复兴的最大障碍。在此,我并不一般地探讨儒家是不是一门宗教,而是讨论将儒家作为一门与其他宗教平行的正式宗教来建设的必要性问题。

—

按照我的理解,将儒家当作一门正式宗教来建设违背了儒学的精神,既无必要、亦且有害。儒学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此世。儒学的高度入世性使得它要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而它的道场不在教堂或寺庙里,而在此世间。过去它的道场在家族、学校、政府等地方,今天则应在家庭、学

校、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等一切实体之中。如果今天的儒家未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道场,那正是儒家需要切实反省的地方,或者说,也正是儒学需要激活自身、以求重新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无需担心儒家没有组织,需要担心的乃是今日儒家能否将一切现实社会中的部门或实体当作自己的组织来建设这一问题。

有些人担心儒家无宗教组织,不能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我认为这是对儒家现代意义缺乏自信的表现。必须认识到,儒家能否应对其他宗教的挑战,主要看它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等方面的功能能不能被激活。这不是一个儒教组织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今天的儒家自身在进德修业方面做到什么地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儒家传统在安排人间秩序、安顿人们心灵、重铸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现代价值缺乏自信,那么也不要寄希望于建立一组织来解决问题。试问,自身的心灵都没安顿好,又如何去安顿别人?此外,儒家的任务与使命与其他宗教有同也有异,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竞争,不需要模仿其他宗教那样来建立组织。再说,我们已经有诸如书院、协会之类的大量儒学组织(可都是法人社团啊),大家不还是对他们不满意吗?设想明天把“儒学协会”改成“儒教协会”,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呢?万一还是和现在一样,一些我们不满意的人或不满意的管理方式在起作用,那时我们怎么办呢?因此,今天儒家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不从内在的角度思考解决之道,指望通过建立儒教组织来解决,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有人认为,现在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有一个庞大严密的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策略地“征服中国”。对此,我想说的是,儒家从不主张以任何进攻性、侵略性的方式扩张自身。儒家不主张“征服”,而主张“化育”。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为什么儒家这样主张呢?因为他相信“以善养人”方能“服天下”(《孟子·离娄》),因为他发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因为他认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我们不是一直批判异教侵略性太强、并以儒家“和”的精神自豪吗?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我们从这些思想学到的伟大智慧是,丝毫不必惧怕任何其他宗教的组织,只怕自己心未正、觉未明,不能“以斯道觉斯民”(《孟子·万章》),没有化育四方的无穷力量。《诗》云:“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将主要功夫用之于“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行动中,不必与异教抢地盘或作斗争。

再说,儒家“身份模糊化”的特征,完全是由它自身特征内在地决定的,这是它的劣势也是它的优势。取消了这一点,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建立儒教,有了严密的儒教组织(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儒家信徒的身份就必须有明确标准,而这可能导致儒家的变质。因为,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加入与不加入、信还

是不信,对信仰之路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不像佛教或道教那样,一个皈依的承诺代表了信仰道路上十分重要的起点。对于儒家来说,“道不远人”(《中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因此,是否承诺自己皈依于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悟道。入道只有程度之别,而无完成之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每个人都在“道”中,又随时偏到“道”外。儒家强调自己与世俗社会全面相融,任何一种从身份上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分隔开来的做法都不利于此。尽管别的宗教信仰徒可能也有类似的“随时偏离、永无止境”特点,但由于它们的出世性,决定了明确身份对修道过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儒家来说,即使是自觉的修道者,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时也不必要。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是“儒”,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他总是能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做人行事吗?如果答案为否,说他是儒又是什么意思?严格说来,在儒家传统看来,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个阶梯更多地代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非任何特定的修道者的身份。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儒还是非儒,都无严格确定的标准,不能客观化。

儒家的义理特点也决定了身份不明确的必要性。一旦设立宗教,就必须将身份明确化,为此必须有一个义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必然是“我践行五常”、“我敬天法祖”、“我信奉六艺”、“我追随孔孟”之类,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高度理性主义。儒家不主张把任何义理或价值当作“前提”提供给人,而要求人们运用理性去分析、拷问或检验。因此,虽然一个人主观上可以坚定不移地信仰儒家的价值,但是他不能把“信儒家价值”当作别人进入儒门的前提,而是要人们在生活中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成全自己。对于儒家来说,即使面向外人或民众,有时也不必强调自己的身份,要让人们自觉地体会“道”无所不在;人们越少一份学儒的压力,就越多一份入道的自然。换言之,一旦将儒家的身份明确化,上述某些客观的义理标准,就会成为信徒入儒门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儒家反而可能沦落为杀人的武器,这正是历代大儒所最担心也坚决反对的。

## 二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人今天没有信仰,需要在宗教中找信仰。首先,人们会问:找信仰一定只能在儒家中找吗?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当中找呢?难道仅仅因为儒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吗?难道仅仅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吗?不少提倡儒教的文章中都提出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普世情怀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以后我们教育子孙后代信仰儒家,就势必面临不断向他们灌输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问题。而我们的子孙一定会不断地追问我们:你们不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吸取人类所有文明的精华吗?如果我确实觉得其他某宗教对我来说非常好的话,为什么不能选择它呢?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将儒

家降格到比上述所有这些伟大宗教都不如的境地。因为这些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存在的。

其次,要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确立神圣感(所谓公民宗教),真正紧要的任务是说明儒家价值为何能为当代生活提供神圣感。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古今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产生极大差异,今天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找到相应的实践方式。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孟子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和“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等思想,讲的就是个体的神圣价值问题,当然也是神圣感问题了。需要说明这种心性论在实践中如何为今人提供尊严和神圣感,这其实是修身问题。因此,如何在今天摸索出一套新的修身之道,激活宋明理学的心性传统,才是确立神圣感的重要途径。不在这些紧要问题上用力,而是高喊建立儒教,岂不是舍本逐末?

其三,要为国人寻找信仰,也不一定非要把儒家改称为儒教。历史上儒家传统为无数代学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人生信仰的源泉,不都是在儒学/儒家的名称下实现的吗,为何一定要以宗教的名称实现呢?有人可能认为宗教本身具有强烈的信仰意义,将儒家改成儒教,其发挥信仰的作用将更大。其实不然。宗教之所以能为人们提供信仰,不是因为它的名称,而是因为它的信仰足够伟大,它的魅力足够动人。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恰恰在于,如何让儒家的信仰世界真正在现代世界和现代人身上显示出自身的强大魅力。

### 三

还有人说,儒家历史上主要是靠儒教方式发展的,汉代以来儒家就已经变成儒教了。可是,汉代以来人们也没有把儒家定义为我们今天这种意义上的儒教。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要将儒教定义为当下中国的国教。如果照此思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今天的儒家如何还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今天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在有关学者的论述中,我看不到真正有力的基础,尤其看不到宗教家的普世精神和博爱情怀。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或本质成份。因此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得让儒学从一家之学重回中国政治及社会结构的重心。然而,中华文明是不变的吗?且不说历史上道家、佛家、法家乃至诸子百家也都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甚至核心成份,今日中国文化已发生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何一定还要以儒家为核心呢?这些问题不解答,不能轻率地提倡国教,以免给人不讲理之感。

首先,宗教的魅力也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需要通过一门宗教特有的包容一切的胸怀和感念苍生的大爱来展示,所以它时常要从人类苦难的命运和人性永恒的需要出发来奠基自身。在当前学者倡导儒教的言论中,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精神,我们看到的只是如何捍卫中华文化、如何与其他宗教抢占地盘之类的民族情感。

退一步讲,假如要使儒学或儒教成为国教,除了实际操作的难度之外,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儒学成为国教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是要说明: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如五常、忠孝之类,如何还可以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正如马英九先生在2008年元旦献词中所表达的,多数华人今天都已将民主、自由、人权等当成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了。因此,必须要先解决马先生的话究竟是不是正确、为什么严重误导了国人的问题。

其次,儒家要成为国教,必须说明它的信仰世界相对于其他信仰世界(如基督教,如佛教、道教等)更有可行性,至少对中国人如此。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声称自己代表终极真理,且最可行。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些宗教自身的理论逻辑,而是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我曾在有关论著中谈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然有深厚的土壤,原因即在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

最后,儒家成为国教意味着它能够全面安排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也即它所倡导的政治制度、社会架构、生活方式等,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文明进步最有效的。可是对这个问题,有几个儒家学者认真严肃地探讨了?

#### 四

当然我反对寄望于以儒教的形式复兴儒家,并不等于我反对建立儒教。如果现在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已经发大心、立宏愿去创建一个儒教门派,我断无任何理由反对他。老实说,创立宗教完全是宗教家的事,任何外人都无法设计。再好的艺术理论也不能演绎出杰出的艺术作品,再好的宗教理论也不能代替宗教家的天才人格。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宗教门派,哪一个不是由人格非常的宗教领袖创建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宗教领袖,光凭呼吁,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象样的宗教或宗教派别的。比如玄奘法师当年创立唯识宗,六祖慧能当年建立南禅宗,星云法师当年创建人间佛教,这都不是任何人事先可以设计或讨论决定的。它不可能由政府主导,也不可能由热衷宗教事业的朋友代替。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倡导儒教的朋友多半没打算自己马上去创立儒教,而是在不断地呼吁、讨论、辩驳。可以想像,如果当初玄奘法师当年创立唯识宗之前,组织各界来讨论,恐怕应者甚稀;如果六祖慧能创建南传禅宗之前,先在全国造舆论,定会胎死腹中;如果星云法师创建人间佛教之前,号召各界来讨论,只有一事无成。宗教家本来就是寂寞的,至少在开始不指望得到同行、大众或政府的有力支持。宗教是一项艰苦持久的事业,需要长期默默、坚忍地努力;宗教家向来行先于言,如果他认定了创建某教派的必要,他就已经埋头干起来,哪还有空去辩论?又岂望舆论来赞同?如今倡导建立儒教的人,多不打算自己马上做,这一现象才特别有趣,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为什么目前倡导儒教的人光说不练呢?

原因在于,目前有些倡导建立儒教的人并不是宗教家,也没打算做宗教家,他们只是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倡议建立儒教。至于具体怎么做,他们不一定躬

行实践。正因为他们不是也不想做宗教家,所以他们多半从外部、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论证建立儒教的必要性。例如,文化主体性、国人信仰、抢地盘等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本质上是功利的,而不是宗教的,不能说哪个宗教是为某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服务的。然而,正因为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宗教的,而是功利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个尚未诞生的“儒教”已被降格为为民族主义或外在需要服务工具的境地。不仅如此,外人还可能指责他们将儒家/儒教自外于人类其他文明,从此以后儒教再也不能像其他伟大宗教那样,从人类苦难的命运和人性永恒的需要出发来奠基自身,因为它的本质目标只不过为了复兴某一个民族罢了。把一门宗教与某一个民族牢牢捆绑在一起,我倒是怀疑,这样对儒学是好还是不好。据我所知,人类许多伟大宗教虽然同样与特定民族的生活或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它们自身从不强调这种联系的必然性,这也正是这些宗教能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他们可能并不认为儒教只对中华民族有益,况且宗教本来就有功利效果。但从宗教自身的立场出发,则不能为了外在功利效果而建立一门宗教。以信仰为例,尽管人们公认信仰是宗教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宗教家通常不会说自己以帮人建立信仰为宗旨,而是会说以拯救苍生为神圣使命。他们为世道的败坏而痛心,为人性的堕落而悲哀,为苍生的苦难而叹息,为人心的腐蚀而感怀。对于宗教家来说,关键不是没有信仰这个社会将如何如何,而是精神的堕落、世道的败坏和人心的腐烂等是一系列社会问题背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及其根源,这个根源如何从自身宗教的理论得到解释。由此可知,从现实功利需要的角度来倡导儒教的人,其实是没有宗教精神或宗教家情怀的,指望他们来建立一门新宗教不大可能。

总而言之,现在倡导儒教的人可能很少认识到缺乏杰出的儒教领袖这一致命问题。没有杰出的宗教领袖,一切建立宗教或宗教门派的想法都如无缘之水、无本之木。所谓宗教领袖,指有伟大宗教情怀的人,他对亿万苍生的苦痛感同身受,对人间世界的丑恶满怀悲悯;他慨然赴之、无怨无悔,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历史上那些最成功的宗教门派,哪个不是由这类宗教领袖建起来的?宗教领袖往往有极为特殊的人格气质,斯人有九死一生的精神,有赴汤蹈火的勇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是家破人亡、坐牢砍头也在所不惜。宗教领袖的魅力在于能树立强大的精神权威,具有无穷的感召力,这是确保一个宗教或宗教门派得以创立并有效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源动力。否则宗教组织内部就可能因为相互不服、彼此争斗而分崩离析,遑论做强做大、代代相传乃至源远流长。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谁愿听谁的啊?像玄奘法师、慧能法师乃至今日的星云法师都是有特殊人格魅力、从而能创立新宗教门派的人。然而,宗教领袖是呼喊不出来的。试问今天倡导建立儒教的人,您们准备好了吗?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儒教热(如果有的话),并不能真正被称为宗教诉求,而是政治诉求或民族主义诉求。这是因为,许多人倡导儒教的主要理由往往是要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解决国人的信仰危机、与基督教抢地盘等

等。他们的动机也许可以理解,甚至有些地方值得称道,但这些动机不能算作宗教动机。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当他面对其他异教或邪教的时候,应该从自身宗教的教理出发,从异教的泛滥看人间罪恶的根源,从邪教的盛行悟苍生苦难的本质,从世道的败坏求拨乱反正的途径。他所看到的首先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危机,而不是自身宗教的危机;即使是感叹自身宗教的危机,也是出于拯救苍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人们固然可以出于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或民族需要倡导儒教,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宗教需要。

有人用“阵地战”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中国文化复兴,我想这不应是宗教家的襟怀。严格说来,真正的宗教不设置对手,他真正的对手永远是人性;真正的宗教家不承认敌人,他真正的敌人是他自己。宗教家真正关注的焦点是人性的堕落、世道的败坏或大众的盲目等,而不应是某个现存的宗教或教派;如果他真的相信真理在自己手中,就不会把任何现存的宗教当作敌人,因为他相信自身能唤醒千百万民众,最终让所有的邪恶隐于无声,退于无形。如果宗教家要批判某个别的宗教或教派,那也是出于对人性、对道德、对世界的忧患,而不应是“你们征服了中华文化”之类民族主义心理。从最近一些倡导儒教的朋友发表的儒教言论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已成为其主要理由,这显得非常不讲道理,完全缺乏宗教家的博大胸怀。宋明理学家批评佛老,也没有用这种民族主义语言,而是说他们“无父无君”。我建议现在如果一位儒者反对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都不要用这种让人感觉不讲道理的民族主义语言,而要在普世、永恒真理上与人家较量。否则只能证明我们自己还未化,又何以化人?自己未化,所以才会信仰民族主义,而骨子里则是“山头主义”。我相信基督教或其他一切宗教都不是儒家的敌人,儒家应该学会去爱他们、去包容他们、去吸纳他们。我们真正应该的对象是亿万斯民,只要我们融入这片无边的海,哪有什么异教或邪教值得我们害怕的?

我也知道,确有不少提倡儒教的朋友,并没有这种政治动机或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纯洁善良的学术关怀,真心诚意为儒学发展着想。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儒家的现实意义丧失自信,故寄希望于“组织”。

## 五

最后我想谈谈今天建立儒教的现实难度。

我从来没说,儒家传统没有强烈的宗教性,但鉴于宗教这一概念定义的不统一性,特别是今天很容易在社会上被误解为神灵崇拜甚至迷信等特点,将儒家当作宗教来建设,还会给自身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各界,都不具备接受一门新宗教——儒教的心理基础,更谈不上接受儒教为国教了。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提出或创建作为一门宗教的儒教,一定会受到诸多质疑,甚至极为严厉的批判,最终给儒学带来的不是推动而是伤害。事实上,任何儒教活动均可以儒学/儒家名义进行,两千多年来都是如此;而一旦冠以宗教

名称,就可能招徕不必要的是非。因此,我劝有关学者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也要三思而行;即使真的想搞儒教,也以打着儒学/儒家的旗号进行为宜。

有人可能指望官方大力资助搞儒教,这是非常天真也不应有的想法。首先,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支持儒学与支持儒教是两码事。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一门组织严密的新宗教的诞生应该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甚至可能被当作封建迷信,当作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尽管这在儒教提倡者看来是冤枉的。也许有人指望通过发起一场民间运动来赢得官方的支持,实践证明,这种给政府施压的策略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上的幼稚病而犯的错误已经不少,其中不乏大量惨痛的血的教训。作为学人,特别是弘扬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学人,在政治方面千万不能有幻想。

其次,即使政府明天真的资助一些人搞儒教,也一定会非常谨慎。一定会任命现有的带官方色彩的儒学组织(如国际儒联、孔子基金会等)担此重任,由若干官员任职其中,对一切活动严密监控。到最后,新形成的“儒教界”将与今天的“儒学界”一样,还是原来那帮人物,还是原来那种格局,还是原来那些活动。也许惟一的差别不过是,原来的儒学组织摇身一变为儒教组织,新瓶装旧酒,贴了个新标签而已。可这样一来,现在呼吁儒教的朋友一定大失所望了吧?

其三,还有一种可能,假想政府明天真的拿一大笔钱来资助搞儒教,定会有许多人想尽办法向官方靠拢,拉关系、走后门,最终是那些在官方有后台、有背景或有关系的特殊人士搞到了钱;那时天底下一定会“冒牌儒教大师”层出不穷,人人争先恐后,个个找政府要钱。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者可能由于正直、不愿意搞关系而被冷落一方,甚至受到排挤。可以想像,那时“儒教界”将是怎样一种混乱和混战的局面啊!然而,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宗教本来就是宗教家的事。没有宗教家费尽心力乃至舍生忘死去建,指望靠政府的支持来建立一门宗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

[责任编辑:嘉 耀]